



王杰
编著

学府探赜

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

XUEFU TANJI



学 府 探 赜

——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

王 杰 编著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府探赜：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 / 王杰编
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18-5428-0

I. ①学… II. ①王… III. ①高等学校—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4509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69mm×239mm
印 张	22
字 数	406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定 价	43.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本书取名《学府探赜》，“学府”特指“高等学校”，“探赜”取“探求细微”之意。因《史通》有《探赜》篇，借而说明这是一本研究高等学校具体历史问题的书。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副书名指出是关于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此书虽然分成三个部分，但是核心内容谈的都是关于中国近代大学初创时期的历史问题。此外，取名《学府探赜》也是为了与我编写并已经出版的《学府史论》《学府典章》等书相联系，形成一个学府丛书系列，以备查看。

《学府探赜》这本书包括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关于北洋大学校史研究的一些线索和成果，取名“北洋泥鸿”；第二部分是对于教育史和教育问题研究的一些思考，取名“德乐闲思”；第三部分是关于我国近代大学初创历史研究的一个具体案例，取名“它山之石”。

一本书包含了三部分内容，颇有拼凑之嫌，这样做源自我所遇到的三件事。

早在2010年我就计划编写《学府探赜》这本书，起因是2011年我就60岁了，面临退休。人退休，事业不能中断，应提前做好交接的准备工作。自1983年开始进行北洋大学校史的研究至今，在长达30余年的研究中我感到花费精力最多和最困难的事是关于资料的查找和对问题的考证，这些困难的形成有其长期的历史原因。

北洋大学在历史上遭遇过四次迁址和大迁徙。第一次是在1900年，因八国联军打入天津，北洋大学初创时的校址——博文书院旧址被德军占为兵营。因战事突然，学校的图书资料未能及时转移，其下落至今不明。1901年北洋大学在西沽择址重建，1903年北洋大学在西沽新校址复校，此为第一次迁址，由海河南岸迁到北运河畔。第二次迁址是在1937年，是年暑期七七事变爆发，西沽校址被日军占据，学校被迫仓促西迁入陕，少部分图书资料事先寄存银行，

事后得以归还,但大部分散失。第三次迁址是在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西安等地返回天津,因回迁条件很困难,很多东西无法携带,一些图书资料留在西北。第四次迁址是在1952年,通过院系调整,北洋大学又从西沽迁到南开校区七里台校址。其后天津大学进入陆续调整时期,文科部分调到南开大学等院校,20多个系、组调往其他院校,同时有关图书资料一起随迁,至今南开大学图书馆中许多文科类图书盖有北洋大学图书馆的印章。

除了以上四次大的迁移,历史上还有一些变故造成了校史资料的缺失。

北洋大学创办于甲午之战以后,由当时的洋务派兴办。1895年甲午之战的失败为洋务运动画上了句号,随后“公车上书”维新变法开始,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二次维新……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一系列的事件造成北洋大学堂掌校人频繁更换,事件支离破碎,客观上难以形成系统的文件。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据我国台湾所存档案资料显示1912年至1928年的教学档案基本连贯,但是在此期间北洋大学由综合性大学改为单办工科,法科调到北京大学,法科资料随之调往北京大学,由于历史原因和校际交流,北京大学校史馆和图书馆有一些北洋大学的零散资料,但至今难窥全貌。

再有1928年北洋大学主楼着火,整栋大楼付之一炬,主楼为北洋大学办公大楼,是所有管理性文件的所在地,事后校友回忆,此类资料尽为灰烬。

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了肃反、整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天津市公安局从学校调取了部分档案,这些档案至今下落不明。

北洋大学历经种种变故,档案资料星散各地,而且损失颇多,因此查找起来十分困难。

自1983年进行校史研究开始,我分别查询了天津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南开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西北大学档案馆、西北工业大学校史馆、西北师范大学档案馆、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央文史馆,天津市档案馆、图书馆以及政协文史馆,台湾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大海捞针一样搜集到一些资料,但是从全貌看,北洋大学的历史资料并不完整,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这是我编写《学府探赜》这本书的初衷。

2010年我开始着手编写工作,由于其间参加了教育部重大委托课题“中国当代大学文化研究”和“中国当代大学精神研究”以及“现代大学治理”等,主

编和出版了《学府典章》《文化记忆》及《实事求是 日新又新》等书，又在组织筹划编纂《天津大学志》和《中国当代大学精神的历史研究》两部著作，因此《学府探赜》的编写被耽搁下来。

2013年的一件事对我刺激颇深，在备感伤心的同时深感责任之重。2013年10月，校史老主编张凤来先生突然辞世，令我震惊。年初时体检，他高兴地告诉我一切指标正常，我们约定等我忙完在我校召开的“当代中国大学精神高层论坛暨学术研讨会”后，就校史研究的一些问题好好聊聊。没等会议结束，噩耗传来，老先生突发心梗辞世，悲痛之余深感生命无常。目前，第一批从事校史编写的人中仅余我一人，校史研究的传承责任重大。

2015年是天津大学（北洋大学）办学120年，为迎接120年庆典，学校开始组织力量编写《天津大学志》，并任命我为志书主编，全校各单位500多人参加了此项工作，让我更感到编写《学府探赜》给大家以资料介绍的重要。

此时又遇到一个意外，天津大学的办学章程上报教育部批准，有关部门提出北洋大学与天津大学的承袭关系问题和北洋大学是否为中国近代国人开办的最早的问题，并且告知以上问题源自一部书写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的书。这让我感到十分无奈与感叹！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述问题就有了历史研究的结论，教育部等主管部门和有关教育史研究专家就有所定论，可是该书作者似乎对此不甚了解，提出一些加以臆断性的问题和评价，不得不让人感慨而忧思，仅仅二三十年的时间，历史记忆就褪色了吗？有些问题就必须重新谈起吗？这改变了我这本书原有的表述方式，不得不针对一些问题，将已经有研究结论的问题，根据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再次进行答疑，以便澄清历史和供以后的研究者参考。由此，也使该书的研究问题集中到中国近代大学初创之史实考源上。

学术研究是需要积累的，不可能让每一位研究者都重走一遍“西天取经”之路，那样做太费时、费力，但是前人的研究也不可不知，希望该书能够使得后来的研究者节省一些时间和精力，多做一些更加有益的事。

第二件事源于我校大学章程的制定。2013年年底我校大学章程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上报教育部等待批准。大学章程的草拟过程是一个回顾历史、梳理当前、反思得失、规划未来的过程，是一次提升全校师生尤其是领导文化自觉的过程，也是一项涉及依法治校的系统工程。我有幸参加了此项工作，在此过程中思考了许多问题，书中第二部分就是我根据历史研究的感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这些思考都明显带有历史研究的特点,这源于我的学科基础和专业背景。我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又长期从事校史研究工作。2003年由校史研究扩展到教育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编写并出版了《中外大学史教程》,开设了全校选修课“中外大学史”。2005年年底我调到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庆幸这次的工作调整,为我赢得了专心“闭门修炼”的机会。我陆续申请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教育科学课题和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先后开展了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包括卓越人才培养、工程教育改革等)、比较教育研究、大学文化与精神研究等,陆续主编和出版了《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学府典章》《文化记忆》《实事求是 日新又新》等著作。同时,参加了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管理改革等一系列实践。

2011年李家俊校长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研究所要为学校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校、院两级的支持和许多教师的共同努力下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建成,承蒙领导和同人们的抬爱,推举我为学科带头人。该学科从2012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同时,为加强研究力量,招聘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位“985”高校的博士毕业生充实研究队伍,学术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

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队伍的加强,我们更加有能力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关注学校的未来,努力承担起学校的重托。第二部分内容涉及对中国大学一百多年办学历史的认识,对于高等教育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认识,对于高等教育作用的认识,对于大学文化建设的认识,对于大学之道的认识,对于大学精神的认识以及对于大学评价和学校发展的前瞻。由于是一些思考,重在思维的启发性,谈不上理论的系统性,由中国大学起源谈到未来发展,天马行空,且想且书,谈不上严谨,仅供高等教育界的同人们商榷。

第三件事是2013年11月武汉大学举行120年校庆。这件事提出之后引起武大内部和社会反响。校内,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明确提出不同意见,武大校史研究专家吴晓老师写了严谨的历史考证文章,指出武大的历史不能从自强学堂续起;校外,潘懋元、刘海峰、孙邦华等多位教育史研究专家也提出不同意见,希望学校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论证校史,中央教科院的储朝晖研究员甚至直接发表文章提出“请武大向社会展示真实校史”。这件事也关系到中国近代大学初创的史实研究,无法回避。

早在20年前,武汉大学提出百年校庆之时,就得到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意见,《光明日报》发表了内参,潘懋元、刘海峰、凌安谷等多位教育史专家明确提

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当时的武汉大学的一些人对于专家的意见断章取义,引起专家的强烈不满。

时隔20年,武汉大学校庆又掀波澜,一些从事高校校史研究的人找我询问当年的情况,索要《光明日报》的内参和潘懋元、刘海峰、凌安谷等人的文章。我发现,时间真的会使颜色消退,也会使记忆模糊,有必要将有争论的历史记录下来,提供给后人,避免许多重复性工作和无意义的争论,因此有了“它山之石”这部分内容。

一本书,三部分内容,看起来杂糅,实则主线还是一条——中国近代大学初创的史实研究。对于这样的研究,我推崇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观点:“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可凭空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迎合自己主观的态度。”只有树立严肃的学风,严谨治学的态度,踏踏实实地搞研究,研究成果才有文化遗产的价值。

2014年8月3日星期日

中伏第七天

目 录

北洋泥鸿

北洋大学堂建设初期的名称·····	3
北洋大学建立的历史条件·····	12
军机处随手档与朱批“该衙门知道”·····	22
北洋大学堂的办学层次·····	27
我国第一批大学章程的意义和影响·····	41
北洋大学堂与博文书院的关系·····	48
对于盛宣怀奏折的认识·····	54
《北洋大学校周年概况报告》所记述的内容·····	67
关于《国立北洋大学校一览》的解读·····	74
《北洋大学过去之五十三年》表述的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北洋大学·····	97
清末对于北洋大学堂毕业生的殿试和奖励·····	113
民国初期北洋大学的有关史料解读·····	121
民国时期几张课表与印鉴的史料价值·····	138
三位国立北洋大学校长的任免情况·····	151
抗战中的国立北洋工学院·····	158
中国斐陶斐励学会史略·····	162
解读赵天麟校长的校庆贺词·····	173

天津大学与北洋大学的承袭关系	181
学生社团“北光社”	183
新中国成立前夕北洋大学的学生运动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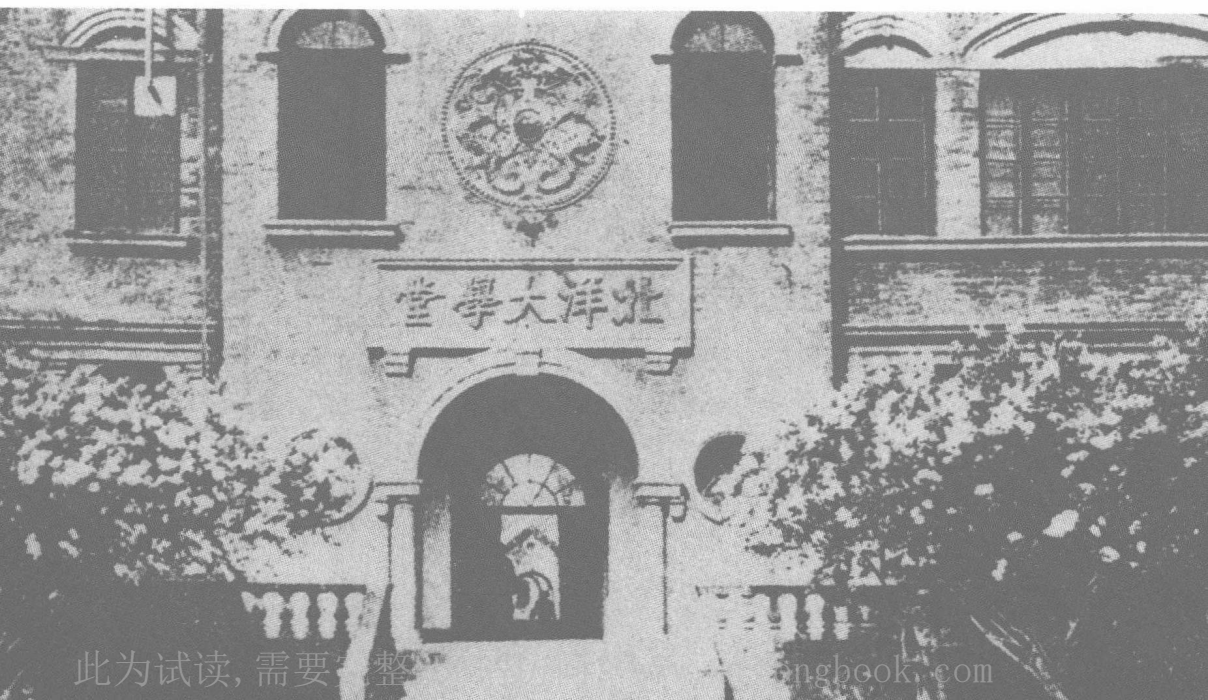
德乐闲思

《德乐斋闲思录》之一：大学该怎样办？	193
《德乐斋闲思录》之二：对大学文化功能的认识	206
《德乐斋闲思录》之三：感悟大学之道	213
《德乐斋闲思录》之四：关于中国大学精神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218
《德乐斋闲思录》之五：中国近代教育看天津	225
《德乐斋闲思录》之六：发现西北联大	237
《德乐斋闲思录》之七：论抗战期间西北工学院的严谨治学精神	247
《德乐斋闲思录》之八：以培养卓越人才的视角认识李书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256
《德乐斋闲思录》之九：看大数据如何解析盛宣怀	270
《德乐斋闲思录》之十：关注美国高等教育热点状况分析	275

它山之石

关于武汉大学校史渊源的论证意见	潘懋元 刘海峰	293
刍议高校设置、变更、停办中的法律问题 ——兼议编写校史沿革时的相关规则	凌安谷	299
建议慎重发行《武汉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邮票	李荣刚	305
请武大向社会展示真实校史	储朝晖	307
关于中国高校建校时间溯源标准的初步意见	刘海峰	309
校史浮夸二十年，“武大精神”何以立？	吴 骁	316
真实校史的意义与内涵价值	王 杰	330
后记		337

北洋泥鸿



泥鸿乃是“雪泥鸿爪”的略语，原意为鸿雁在雪泥上踏过留下的爪印，借喻为往事遗留的痕迹。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和子由澠池怀旧》一诗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如果将百年北洋大学比喻为一只飞翔的鸿雁，那校史研究就是为了寻找它飞行的轨迹和留下的足痕。此章名为北洋泥鸿，借指探寻北洋大学办学百余年间在历史上留下的事迹。

北洋大学堂建设初期的名称

北洋大学初创时期的名称应为“北洋大学堂”或“天津大学堂”。但是,在现有的教育史研究成果中使用名称多样:有的称为“中西学堂”,有的称为“西学学堂”,也有的称为“北洋大学堂”,究竟应该使用怎样的名称才符合历史事实呢?

(一)“中西学堂”的称谓见于盛宣怀草拟的办学章程

1895年9月19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盛宣怀草拟的筹划建立北洋大学的章程名为《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其首行写道:“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请奏明立案,禀北洋大臣王。”^[1]由此可见盛宣怀准备建立的学堂名称为“天津中西学堂”。

起名“天津中西学堂”的原因,从章程内容解读,章程中写道:“光绪十二年,前任津海关道周馥禀请在津郡设立博文书院,招募学生,课以中西有用之学,嗣因与税务司德璀琳意见不合,筹款为难,致将造成房屋抵押银行。蹉跎十年,迄未开办。”^[1]⁴根据章程中的文意我们可以了解盛宣怀是要将“前任津海关道周馥”没办成的“课以中西有用之学”的学堂办成,因此学堂起名“天津中西学堂”。而且,根据1896年出版的《教务杂志》的记述,周馥和德璀琳筹建的博文书院也是一所大学^[2]。

(二)“西学学堂”的称谓见于王文韶上报朝廷的奏折

1895年9月30日(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北洋大臣王文韶将盛宣怀的奏折择要改拟为《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具奏光绪

皇帝审批。经过对比办学章程和王文韶奏折,我们可以知道盛宣怀提议的“中西学堂”被王文韶改为了“西学学堂”,并且以此名称上报给了光绪皇帝。也就是说正式上报朝廷的学堂名称为“西学学堂”。

起名“西学学堂”的原因可从奏折内容解读。奏折中写道:“所拟章程亦均周妥,应即照办。惟堂内事繁责重,必须通晓西学才堪总核之员认真经理,方不致有名无实。查二品衔候选道伍廷芳,堪以委派总办头等学堂;同知衔候补知县蔡绍基,堪以委派总办二等学堂;并延订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一切应办事宜,仍责成盛宣怀会商伍廷芳等妥速办事,以免因循虚旷岁月。”^{[1]18}根据奏折中的文意我们得知该学堂的办学内容以西学为主,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为“不致有名无实”故而安排“通晓西学”的要员负责学堂事务。伍廷芳,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后获法学博士学位;蔡绍基,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丁家立,美国人,本科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在欧柏林大学研究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882年来华,1886年在天津开设“中西书院”。这些人都是清末为数不多的“通晓西学”的人才。学堂所设学门为律例(法律)、工程(土木)、矿务(采矿冶金)、机械,皆为西学;开设课程皆为西学课程;聘请的教师多为欧、美、日、俄或有留学国外经历的中国教员;管理人员也皆为留学归国人员,改称“西学学堂”准确地反映了学校的西学性质和办学层次^{[1]19}。

对于“西学学堂”的名称,在清朝记载北洋大学创办的文件中还有这样的记述。《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载:“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津海关道盛宣怀倡捐集资创办西学学堂。请飭立案。下所司知之。”清军机处随手档载:“朱批王折报四百里马递发回……六、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1]20}由此可见,北洋大学堂在创办过程中皆称为“西学学堂”,而非“中西学堂”。

(三)“大学堂”的称谓见于政府批文和英文报纸的报道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光绪皇帝的批准是在王文韶奏折上朱批“该衙门知道”五个字,那么“大学堂”的称谓是怎么来的呢?

《直报》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1月8日刊登的清政府颁布的《劝令加捐》文告中写道:“钦命头品顶戴监督天津新钞两盐北洋大臣,冀长办直隶通道事务兼管海防兵备通盛(宣怀),为晓喻事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经费浩繁,曾经该道具详于博文书院三厘米捐之外加捐二厘,已奉奏准,每石收银五厘充学堂经费,当经本道委员劝令粮商遵照去后,兹据津郡众粮商公

议,情愿加捐前来,除详情督宪查核立案并秉批示外,合函出示晓喻,为此示仰粮商人等知悉,自本年九月十五日起,无论有无护照,凡系商贩米麦进口,每石一律捐银五厘,毋得违抗,切切特示。”^[3]在学堂成立的第二个月的政府文告中即称为“大学堂”,这是目前看到的文献记载中最早使用“大学堂”的政府文件。说明朝廷承认了盛宣怀所拟办学章程中的提法: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并同意了经费的使用建议。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刊登了采访北洋大学的文章,英文标题为 *A Visit to the Tientsin University*,中文标题为《北洋大学堂见闻》。文章开头如下:

“This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under official sanction, has now been opened about a fortnight. The arrangements are fairly complete for commencing the first year's studies, though there has not been time to secure the services of the six Professors, whom it is proposed to appoint in addition to the President. The aim of the promoters was to admit 120 youths for the first year, in four classes of thirty each, taking only such as had already a working knowledge of English. About 95 have been already secured. They have been selected by examinations held in Tientsin, Shanghai and Hongkong. At present they are divided into four classes, each under the charge of a competent native teacher. The students are in class from 8:30 a. m. to noon in the morning, and from 2 p. m. to 5:50 p. m. in the afternoon. They have in addition evening studies from 8 p. m. to 10 p. m.

... The course of study is to include, in the Preparatory Grade — the English Primer, Reading, Grammar, Letter-writing, Translation, Arithmetic, Mensuration, Algebra, Geography, Plane Geometry, English Composition, the Elements of Science and History; in the College Grade — a very comprehensive course in Physics, Solid and Spherical Geometry, Drawing, Chemistry, Astronomy, Botany, Biology, Mineralogy and Geology,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Law, with special courses in Civil, Electrical, Mining and Mechanical Engineering. Liberal allowance is made for the board of the students, with not ungenerous allowances for incidental expenses; and they will be admitted, now that the College and Preparatory School are founded, by examination in Chinese, and, for the first few years, without

fees.”^[4]

译文大致如下。

该机构获得官方许可创立,从开学到现在已经有两个礼拜了。该校现在所做的准备,基本够第一年学习活动之用;原本在聘任总教习(President)之外,拟聘任六位教授(Professors),但时间仓促,还未能如愿。最初创校人计划第一年招收 120 名学生,平均分成 4 班,英文要稍有基础。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都设有考场,通过考试选拔共已招到 95 名。目前这些学生分成 4 班,各由一名中籍教师管理。学生上课时间为早上八点半至正午,下午两点至五点半,晚上从八点到十点也有课。

……二等预备学堂的课程有英文基础、阅读、语法、书信写作、翻译、算术、测量、代数、地理、平面几何、英文写作、科学与历史基础知识;头等学堂(College Grade,或可译为“学院级别”)的课程有基础物理、立体与球面几何、绘图、化学、天文学、植物学、生物学、矿物与地质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还有土木、电气、采矿和机械工程学等专业课程。住宿学生的补助都很优厚,其他的杂费支出补助也不少。现在头等和二等学堂都已创立,要入学的话,都要通过考试,考过入学的,前几年不需费用。

由以上内容可见,这篇文章采访于北洋大学堂成立两周后。北洋大学堂获得官方许可创立,采访时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均已创立。按记录下来的有关课程的目录,可见二等预备学堂的课程,都是中学水平的基础课程,但这是为了培养适合进入高等学堂的学生;而高等学堂已经具备较完整的综合性大学的课程体系。

文章结尾对于盛宣怀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建成西式大学表示了肯定和赞赏,并用中国文字表述为“北洋大学堂”。原文如下:

“While the appointments are by no means as elegant and complete as characterize a Western University, they are 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desired for utility, cleanliness and success, and it is most creditable that so much has been accomplished at such short notice. Great praise is due to the Customs Taotai H. E. Sheng to the Directors and to the President for the successful inauguration of what in Chinese language will be called the 北洋大学堂.”^[4]

1896 年英文版《教务杂志》先后两期刊登了有关北洋大学堂的内容,其中一篇写道:

“As the traveler approaches the emporium of the north on his way to the imperial capital his attention is arrested by a conspicuous pile of buildings on the banks of the Peiho. That is the nucleus of a new university, now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an American (Mr. C. D. Tenney).”^[5]

译文如下：旅行者若穿过北方的这个商业重镇到首都去，会被海河沿岸这一系列显眼的建筑所吸引。这就是新成立的大学的核心区域，总教习是美国人（丁家立）。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到北洋大学成立后即被称为“大学堂”或“北洋大学堂”。中国政府和外国媒体都承认其为“大学堂”。从目前查阅到的资料看，在北洋大学堂成立之前没有学校使用“大学堂”的称谓，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使用“大学堂”字样的唯有“北洋大学堂”一所学校。

既然学校建立时名称就是“北洋大学堂”，为什么在1990年出版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中有这样的表述：“1895年创办时名为‘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原因是编写校史第一卷时上述资料尚未被发现，根据刘仙洲校长考证校庆纪念日的文章推断“说明1917年之前已称为‘北洋大学堂’”^{[1]39}。

以上资料可以客观反映的历史事实是：

1895年9月19日盛宣怀草拟的章程中学校名称为“天津中西学堂”；

1895年9月30日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奏折中学校名称为“西学学堂”；

1895年10月2日光绪皇帝批准后政府称学校为“大学堂”。这一名称得到了国外媒体的认可，并认为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性质的大学。

北洋大学堂的校名，源自学校建立之日，因此可以确定：学校创建之初名称即为“北洋大学堂”。根据《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萃编》所撰写的北洋大学条目“天津头等学堂，亦称北洋头等学堂、天津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创立，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6]。以上称谓摘自盛宣怀档案，因此称为“大学堂”是没有异议的。

从1900年颁发的第一届毕业生考凭，到1911年所发毕业文凭，所盖学校印章皆为“监督北洋大学堂事务之关防”，这是国家批准使用的公章，因此根据公章名称确定建校名称为北洋大学堂是正确的。